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大学的人文教育

张岂之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大学的人文教育

张岂之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人文教育/张岂之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8932-6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高等学校—人文素
质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4178 号



大学的人文教育

张岂之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932-6

2014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插页 2

定价: 32.00 元



北大红楼（沙滩）



北大教室（沙滩）



清华学堂



清华大礼堂

序

这本小书不是从教育史角度去研究我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而是我在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一些感悟。我从事的专业为人文学科，特别是史学与哲学，许多感想和体验都和大学的人文教育密切相关，故采用了《大学的人文教育》这个书名。

商务印书馆编审谢仲礼给我写信，又约我面谈，我们有这样的共识：从宏观看，我国大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围绕着如何使我们的民族从屈辱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迈向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许多杰出的教育家、人文学者、科学家、青年学者为这个伟大的理想贡献了聪明才智，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历史。关于这个历史，不仅需要从事高教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去研究和撰述，也要有曾经在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的朋友们从自身所体验的特殊角度去加以回忆、提炼，使它更加完整，更易于被人们所认知。出于这样的目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教师陈战峰、宋玉波和夏绍熙收集、整理了我曾经写过的关于大学人文教育的文章（几乎都曾经公开发表过），又经过修订，使这本小书得以面世。

2 大学的人文教育

读者朋友可以看到,这本小书只能说是一位人文学人对我国大学里人文教育所怀有的敬重之情。而且我相信:我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传统不会中断,它将与时俱进,传承创新。

张岂之

2013年11月17日

目 录

清华的人文传统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 80 周年	1
北大的北楼	9
忆随汤用彤先生学习西方哲学	14
真正的老师	22

论大学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研究	28
----------------------	----

简议人文学术与个性	37
-----------------	----

对立耶？一体耶？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	45
------------------------	----

论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

——纪念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	56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6

大学教师与人文素养	82
-----------------	----

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	90
----------------------	----

关于大学素质教育的再认识

——祝贺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成立	98
-----------------------	----

2 大学的人文教育

高等教育与文化育人	105
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理论	112
大学如何践行文化育人？ ——高等教育研究会召开十届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感言	120
一个先进的教育理念 ——谈大学文化素质教育	125
大学文化育人的新成果	131
育人为本与文化育人 ——2011年9月26日在呼和浩特市老教授 协会上的发言	138
论科技伦理教育	146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华例举及其效用	15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略论 ——2012年12月在西北大学的一次讲演	168
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180
我对中国大学精神的理解	192

附录

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	195
-------------------	-----

清华的人文传统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 80 周年

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 1911 年，名清华学堂。1925 年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研究院讲师（即导师）。研究院存在的时间不长，1929 年停办，但其影响深远。探讨清华的人文传统，不能不从国学研究院开始。

梁启超与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结不解之缘，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奠基者之一。他于 1911 年到清华讲演，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他最早在清华提出将传统与当代、中学与西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王国维也有类似思想。这些在国学研究院中得到体现。

例如，研究院聘请导师有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全体”（整体）有所研究，不是一点一滴，也不是一鳞半爪，

2 大学的人文教育

能够把握其总体精神;还要求导师们能用新方法去梳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同时了解世界学术发展之趋势,从而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倡导导师与学生个人接触,在人品上和学品上给予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所有这些并非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8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上述四位导师在国学研究院开出的课程,仍然会惊叹他们学问的渊博、境界的开阔。国学研究院在短短几年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文学者,这和导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国学研究院为清华奠定了人文传统的深厚基础,她的精神后来为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群所继承和发扬。清华校史上繁花似锦的人文课程和成果,是国学研究院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需要从更加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去思考国学研究院的内在价值。

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东西文化的会通与创新。这里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作简要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新发现的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

^① 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运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①

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史，史料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刊载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②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会有学术创新。他所作《静安先生遗书序》又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研究上超越前贤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陈寅恪自己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史研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从元稹、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② 陈寅恪：《陈寅恪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4 大学的人文教育

白居易的诗词中发现唐代艺术文化的前后变化，又从元、白的乐府中考察唐代史事，以文证史。他在中国中古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与他这种开阔的学术胸襟密切相关。

我在以上所写关于清华国学院导师们在学术上会通创新的一点一滴，只能起“举一反三”的作用。他们和其他清华人文学者在学术创新上曾经作出过很大的功绩，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可惜这方面的学术历史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有些愧对前人了。

三、自强不息

清华的人文传统还表现于：师生们力求在人品和学品上自强不息、追求完美。按照 20 世纪 30 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著名的散文作家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 1931 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外国文学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从清华人文学科上的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人们会问：为什么如此？清华人文学者自身的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体验到“学，然后知不足”的真理，而且生活、工作在一个有着优良学风、校风的环境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清华国学院和后来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及全校的经

验，被归纳为一种教育理念，这就是194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①此理念说明：专家和大师不同，大师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成果具有宽广、深厚、会通、创新的特色，而专家只是在某些点上有所研究并作出成绩。在人文学科方面，清华人文学科出现的大师不是一两位，而是群星灿烂。他们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但他们的学术遗产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俗语云：“严师出高徒。”清华人文学科中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不是少数。如钱锺书于1929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他在大学时期即表现出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当时发表了许多文章，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哲学、美学问题、翻译问题等，说明具有宽广深厚的学科基础，这些和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密切相关。还有1931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主修德文专业的季羨林，从他的《清华园日记》（大学三、四年级时所写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读书的范围相当广泛，在学生时代即开始文学翻译，对教授们的讲课敢于评论，直抒己见。清华毕业后他在济南工作一年，考取官费留洋，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东方语言，研究东方文化，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他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清华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梦吟水木清华》的散文写道：根据他亲身受教的体验，清华的校风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这八个字表述最为恰当，这是关于清华人文传统的一种概括。

四、最高表现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她总是和具体的历

^① 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6 大学的人文教育

史条件相联系，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清华的人文传统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用冯友兰的话说，西南联大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在战争烽火中南迁，历经艰难险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汇合，于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上课，文学院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这里的条件跟清华园无法相比。当时清华中文系闻一多教授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南岳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头满是沙子，肉是臭的，素菜大部分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并不享福，但是我的精神非常充实，在南岳所开两门功课听讲的人数很多，似乎是这里最大的班。听得也很集中，我讲得也很起劲。”^①由此可以想见，闻教授在讲授《诗经》《楚辞》时，其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听课的大学生们。

1938年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向西南迁移，有些教授选择步行，不愿坐车。当有学生问闻一多为何不坐车，他回答说：“困难之中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虽然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太少，多走些路没有坏处。”^②193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培育了西南联大，将三校各有特色的人文传统加以融合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表现了中国大学在国难当头时的卓越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从1938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在八年间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正如曾经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

^① 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② 冯友兰：《怀念朱佩弦与闻一多先生》，《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5期，转引自张守常：《最完整的人格》，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